

1

导 言

经济增长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一切文明与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要实现本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并在下个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保持经济的迅速、稳定、健康增长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但是，回顾我国经济建设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又不难看出，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干扰，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有很强的片面性，存在问题较多，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极大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如何在比较经济增长的利益和为此付出的代价的基础上，正确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优化经济增长的路径，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本书试图通过对经济增长所涵盖的各个主要领域的优化问题进行较为系统、深入分析和探讨，以期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点理论上的参考。

1.1 经济增长与增长优化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人们在使用中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本书的开篇有必要对其加以界定。至于经济增长的优化，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我国多年经济建设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

1.1-1 概念的界定：经济增长

所谓经济增长，最简单的定义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产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增加或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但是，严格地说，并非国民产出的任何增加都可称之为经济增长。例如，在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的复苏阶段，国民产出较之萧条时期也会有所增加，这种增加往往带有恢复性质，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经济增长。因此，进一步讲，经济增长应该是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它指的是一国或一地区潜在国民产出或经济生产能力的增加。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或相对量的变化来衡量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问题历来是宏观经济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最重要的热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要缩小以至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收入水平差距，就必须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之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而赶超所需时间的长短，则直接取决于两国间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这是一个经过并不复杂计算即可得到证明的经济学常识。

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经济发展。对于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至今经济学家们在看法上仍

不尽一致。多数人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有区别的，例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立克（B·Herrick）和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在其所著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这两个词可能具有不同意义，在使用中一般是隐含的，而在以下说明中就明显了。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指和以前相比产出的种类有所不同以及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增长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获得更多的产出。发展的含义则不只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假如以人类的‘增长’和‘发展’作比喻，增长包含诸如身高和体重之类总量的变化，发展则包含诸如体质协调、学习能力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之类机能的变化。”^①类似的表述还可以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D·H·Perkins）教授等人所著的《发展经济学》中找到，他们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词，虽然有时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但其中却存在着基本的区别。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以及国民产值的提高。不论采取何种办法，只要一个国家的商品产量和劳务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工业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以及农业比重的降低）和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的上升。”^②这里所定义的经济增长，我们姑且称之为狭义的“经济增长”。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就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

①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1983年英文第4版，第21—22页。

②吉利斯·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第14—15页。

提，而经济发展则是经济增长最终要达到的结果。但二者在表现上却并不总是一致的。有经济增长不一定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如果单纯追求产出的快速增长而忽视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降低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益和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为代价；或者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在产出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却出现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结果是社会矛盾加剧，生活质量下降。上述种种情况的存在，可以称之为“无发展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不足取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二战”后一段时期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曾明显地呈现出过这一特点。

强调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及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偏差，绝不意味着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发展也离不开经济增长，它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这正如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所说：“很难想象没有增长的发展。功能的变化总是自然而然地包含规模的变化。一国的经济除非能够生产超过它生存所需要的东西，作为发展标志的产出结构的变化是不可能出现的。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描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我们却认为发展过程几乎必然依赖于某种程度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①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使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时，对其内涵并不加以严格区分。例如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其核心内容讨论的恰恰是前述所谓的发展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Kuznets）提出了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

^①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1983年英文版第4版，第22页。

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相应调整基础上的”。^①这一定义概括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容、基础和条件，不仅包含量的因素，而且包含质的规定性。以此为出发点，库兹涅茨利用大量历史统计资料，深入详尽地研究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总量、速度、结构及其传播扩展机制，并通过对人口和产值增长、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使用结构以及国际依赖关系等诸方面所进行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了这些变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变化特点和相互联系，试图以此来揭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及其规律性。从其所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来看，应该说已经很接近“经济发展”的概念内涵了。显然，这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经济增长”。

上述对于经济增长含义的不同认识，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差异仅仅在于各自研究问题的角度和侧重有所不同，而其最终的落脚点则是同一的。分析经济增长的这两种不同含义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耐人深思的启示，主要有：

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量的扩张必然伴随着质的变革同时发生。不仅经济发展需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要保持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研究，才可能对经济增长问题有正确的认识。

2. 并非任何一种经济增长都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对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优化选择经济增长的目标和途径，并运用强有力的调控手段确保其实现，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①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 发现和反映》，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本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经济增长和增长优化概念的，也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本书立论的基础和总体思路。

1.1-2 现实的要求：增长优化

建国以来，经过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特别是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规模也相当可观。谷物、肉类、棉花、煤、电、钢、水泥、化肥、化纤、机床、自行车、电视机等工农业产品的总产量，已经赶上发达国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1979年~1995年我国 GNP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9.9%，综合国力已由 70 年代的 30 多位上升到现在的第 10 位。但是，在经济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长期单纯追求产量、产值的增长所带来的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这些矛盾和问题已成为当前制约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症结所在，其主要表现有：^①

1. 高投入、低产出，经济运行不稳定。据统计，1980 至 1995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 21 倍，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却不到 12 倍（均为现价，下同）。“八五”期间，累计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总投资近 7.3 万亿元，而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约 3.7 万亿元，平均每百元资金总投入只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50 元。工业物耗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 1978 年的 64.9% 上升到 1994 年的 74.8%。现在我国能源利用率仅为 30%，而一般工业化国家为 50% 以上。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我国为美国的 3 倍，日本的 9 倍，德国的 7 倍，法国的 5 倍，韩国的 4.5 倍，如按国际先进的消耗定额测算，我国每年要多消耗 3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我国能源生产总

^①有关数据和资料主要转引自：（1）《中国统计年鉴》（1995 年，1996 年）；（2）《求是》杂志 1996 年第 3-5 期；（3）《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6 年第 1-3 期。

量的 30% ;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钢材,我国为美国的 5.8 倍,日本的 2.7 倍,德国的 4 倍,法国的 7 倍,英国的 5.2 倍。靠高投入和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加剧了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波动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经历了 4 个周期,增长率的波峰与波谷间最大位差仍高达 10 个百分点。

2. 产业结构失衡,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下。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大致为 20% :50% :30% ,其中第三次产业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 20% ~30% ,特别是科技、教育、交通、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发展滞后,已经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农业基础薄弱,粮食平均亩产和人均用粮水平都较低,全国只有 1/3 耕地应用现代技术,而且只应用现代技术的 1/3。1992 年农用拖拉机的数量,美国为 481 万台,日本为 200 万台,印度也有 114 万台,我国仅有 76 万台。工业中一般加工业发展较快,而基础设施和基础原材料工业的生产能力仍显不足。生产能力长线与短线并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目前棉、毛纺设备利用率只有 75% ,电视机、电冰箱、卷烟等生产能力闲置 30~50% 。此外,不少行业如汽车、炼油等的生产集约化程度低,也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如我国汽车另配件厂、改装厂和整车厂共有 3000 多家,但年总产量还不到 200 万辆,与 90 年代汽车生产厂规模经济的 250 万辆的临界值相比尚有距离,更不用说单个汽车厂的产量了。产品质量差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另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也是影响微观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国家技术监督局资料,1992 年前工业产品合格率为 76% ,1995 年则降到了 70% 以下,全国每年因企业生产不合格产品就损失近 4000 亿元。只重视产量增加,忽视质量的提高,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也使不少企业陷入了困境。

3. 技术进步缓慢,设备老化,生产效率不高。目前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 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60~80% 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 35% 左右的水平。我国现有各种金属切削机床近 400 万台,居世界首位,但将近 90% 是手工操作和半机械化的普通机床,加工的机电产品大多是 60~70 年代水平。据统计,我国主要机械产品达到 80 年代初水平的只占 1/3。机械工业部调查,80 年代中期生产的 5 万多个机械产品品种中,相当于国际上 50 年代产品的占 16%,60 年代的产品占 62%,70~80 年代的产品仅占 22%。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已达 25%,超期服役率为 39%。设备的落后和老化必然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1990 年中、美、日、德、英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1266、46220、51690、58100 和 39205 美元/人,后者分别为中国的 36.5、40.8、45.9 和 31 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淘汰了平炉炼钢工艺,而我国钢产量的 15% 仍然是采用这种工艺生产的。我国虽然已是世界钢铁生产的第二大国,但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每年还要大量进口钢材。我国十大钢铁企业人均产量仅为 40 吨,只相当于日本新日铁公司的 1/17。

4. 资源大量浪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我国很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耕地和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4,石油为 1/8,天然气为 1/29,但在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中,浪费现象却非常严重。最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都超过 1000 万亩。在矿物开采方面,我国绝大部分矿床伴生有用成分未能开采利用,只有 2% 的矿床综合利用率达到 70%。统配煤矿的资源回收率仅为 60%,小煤窑还不到 20%,大量可利用资源永远弃在地下。当前,工业“三废”对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已开始威胁人民的正常生活。现在约有 30% 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放,1994 年全国乡镇企业排放的废水就高

达 43 亿吨,严重污染了全国各地的江河湖泊。工业废渣年排放量约为 7 亿吨,综合利用仅为 3.25 亿吨,历年来弃外堆积达 70 多亿吨,占地 100 多万亩。全国 500 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一级标准的不到 1%。全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360 亿元以上。

5. 国际竞争能力差,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了 10 倍,在世界贸易中从第 32 位上升到第 11 位,工业制成品占出品总额比例增加到 80% 以上,但大多数仍为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品。如纺织品出口量已占世界出口量的 1/7,而换汇额仅占 1/14。中国每吨服装换汇 13323 美元,而意大利、法国为中国的 4~6 倍。日商购买我国丝绸就地加工,每件成本不过 6~8 美元,拿到巴黎时装市场就卖 400 美元,竟超出五六十倍。这种“一等资源,二等加工,三等产品,四等包装,五等价格”的状况导致不少外贸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从国内市场来看,近几年技术、资金密集型进口产品和外资企业产品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率迅速提高,如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轿车、机床、录象机等产品,按销售额计算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50~80%。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机床生产国,而现在却是世界上第二大机床进口国,1991 年以来高档的数控机床和锻压机床进口数量和金额都超过了国产数控机床的产量和产值,两者的比例约为 6:4。

总之,以上种种情况的存在,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中投入与产出、产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以及总量与结构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协调。严峻的现实进一步提出了优化经济增长路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2 优化经济增长的标准和原则

优化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确定经济增长的优化标准和原则。只有标准明确，原则清楚，优化经济增长才有目标和方向，也才能为增长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提供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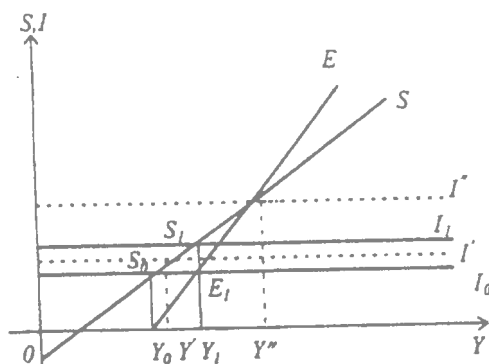
1.2-1 优化经济增长的标准

所谓经济增长的优化标准，即经济增长要达到的目的性要求。以往人们通常习惯于将高速度作为经济增长的首选目标，并视其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这种认识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未免过于片面。如前所述，经济增长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增长过程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同时还必然伴随结构、效益、消费水平以及体制和观念等诸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并且只有在后者获得令人满意结果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才是有效的和可取的，优化经济增长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经济增长的优化标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项内容，即：充分就业、产业协调、运行稳定、效益显著、福利最大。

1. 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标准是指经济增长应有利于吸纳闲置资源，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的利用。显然，这里所说的充分就业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它不单纯指劳动力要素的充分利用，而且指在一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下各种既存生产资源经过最佳的社会组合所形成的综合生产能力，即潜在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通常，当一国经济的增长受到资本约束时，潜在生产能力的增加则主要取决于投资水平。

由于投资具有在形成本期需求的同时增加下期生产能力的双重效应；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与此相

适应，国民经济系统要在动态中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就必须达到一个“适度”的速度。如果实际增长率过低，就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使一部分新增生产能力资源无法得到利用；反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高，超出了潜在生产能力允许的限度，就会由于需求膨胀而使经济陷入全面紧张状态，此时的增长率多半也只能是名义上的。上述几种情况可用(图 1.1)说明如下：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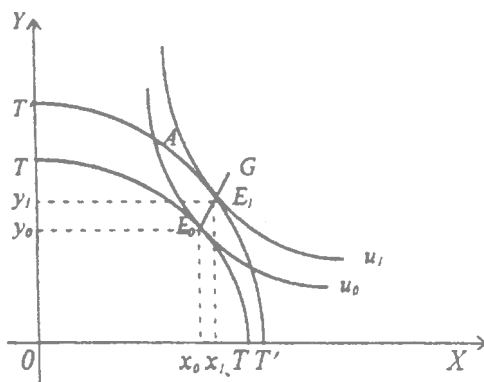
在(图 1.1)中,基期投资曲线(I_0)与储蓄曲线(S)交于 S_0 。此时均衡产出为 Y_0 。假设 Y_0 位于基期潜在产出水平即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上。直线 E 的斜率为资本生产率($\Delta Y/I$) ,该直线与 I_0 线交于 E_1 点,表明基期投资使下一期增加了 $Y_0 Y_1$ 的生产能力产量。为了使这部分新增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下一期的实际产出就应该达到 Y_1 ,“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应为 $G = (Y_1 - Y_0)/Y_0$ 。如果下一期的实际产出小于 Y_1 (例如仅为 Y'),或者说实际的增长率低于“适度”的增长率,那么,就会有一部分新增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其数量相当于 $Y' Y_1$ 反之,如果下一期产出大于 Y_1 (例如为 Y''),由于 Y_1 已经位于潜在产出水平,所以

Y' 实际上是达不到的，其结果只能是名义增长率提高，即通货膨胀发生，这同样是不足取的。

2. 产业协调。所谓产业协调标准是指经济增长应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里所说的产业协调同样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各部门之间在生产上的相互衔接、紧密配合以及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之间的相互适应，而且要求建立有利于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结构，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最佳结合，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此外，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产业协调，还应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演进和转换，即逐步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

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部门增多，部门间交易关系日趋复杂，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在部门间依赖度增大的情况下，由产业协调所产生的结构效益就上升到重要地位，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支撑点。相反，如果产业结构扭曲，且呈刚性，那么大量资本和劳动投入将得不到合理使用，就会出现短缺与过剩并存，严重降低资源配置的效果，即使短期内高增长也许可能，但最终会因结构制约而无法长时期地持续下去。产业协调的含义可通过图示 (1.2) 加以说明。

假定某社会只有 X 和 Y 两个生产部门，图中曲线 TT 为基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表示在当时最好的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投入所有的资源，所能生产的 X 、 Y 产品的最大数量组合。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任何一点的产品组合，虽然可以实现，但是缺乏效率；而在曲线外任何一点的产品组合，又受当时资源和技术水平所限无法达到。因此，最优产品组合只能在 TT 线上寻找。 u_0 线为基期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曲线上各点表示 X 和 Y 商品的各种数量组合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满足程度是相同的。这组曲线可以有平行无数条，由低到高，反映着消费者不同的满足程度。其中较低层次的社



(图 1.2)

会无差异曲线虽然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但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较小；而较高层次的社会无差异曲线虽然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满足，但超出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在既有资源和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难以实现。唯有 u_0 线与 TT 线相切于 E_0 点，该点是同时使生产和交换达到最优状态的结合点，对应的 x_0 和 y_0 即为基期协调的两部门比例。在计算期，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展到曲线 $T'T'$ ，它在形状上较之 TT 线有所改变，反映着不同时期产业间投入产出技术结构的变化。 u_1 线为计算期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它的形状和斜率的改变，则主要是由社会偏好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所致。两曲线相切于 E_1 点，对应的 x_1 和 y_1 即为计算期协调的两部门比例。沿 E_0 和 E_1 点形成的延伸线 G 即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和两部门协调发展的均衡增长轨线。此线外任何一点（例如 A 点）的产品组合都必然造成产业失衡，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

3. 运行稳定。所谓运行稳定标准是指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保持平稳的态势，增长速度波动较小，各个变量都以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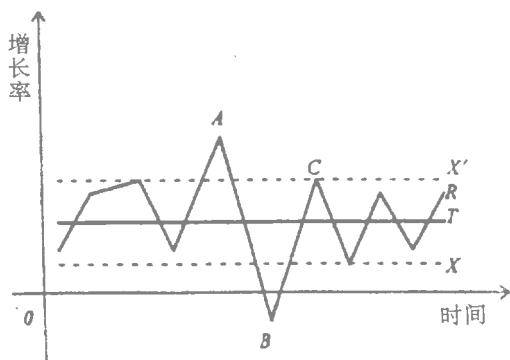
大体不变的比率增长。^①这也是前述充分就业标准的动态化表现和要求。当然,由于国民经济系统庞大复杂,影响因素众多,要达到绝对的匀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但是实现经济的相对稳定增长则确属必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增长过程的剧烈波动不仅会影响各种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和潜在生产能力的发挥,而且会降低一个较长增长时期的总速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所指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问题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一个时点上的经济潜力的损失,都是不可弥补的。如果某一体制由于周期不稳定,在各个时点上未能发挥它的生产潜力,那就无法实现它在整个时期内的可能增长率。”^②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中得到证明,例如从国民收入指标来看,改革前不少年份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曾高达 20% 左右,但由于经济波动剧烈,1953~1978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6%,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改革以来,虽然最高增长年份的增长率只有 15.2%(GNP),但由于经济波动较小,1979~1995 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却上升至 9.8% 远远超过改革前时期,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见,经济增长稳定程度的上升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除了重大自然灾害和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外,经济波动通常是国民经济系统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必然结果,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非均衡的出现又往往不可避免,因此,只要非均衡的程度并未严重影响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这种非均衡的存在以及由此

^①库兹涅茨认为,稳定增长是现代经济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整个长时期中相互连续的几个短时期(如一二十年)内,增长速度降至一个较高的最小增长点之下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参见《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年中译本,第 60~61 页。

^② [美] 保罗·R·格雷戈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中译本,第 39 页。

引起的经济波动便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经济体制保证经济增长稳定性能力的大小，不在于能否完全取消非均衡（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而在于能否有效、及时地把非均衡控制在满足经济正常增长的需要和可容忍的限度之内。这一机制可用（图 1.3）说明：



（图 1.3）

在(图 1.3) 中, T 为经济增长趋势线, R 为实际经济增长线, X 和 X' 为经济增长控制线。运行稳定要求各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位于上下控制线之内。如果某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过高, 超出了控制上限 (例如图中 A 点), 对运行稳定是不利的, 因为过高的增长率往往导致资源使用的全面紧张, 其结果只能是高速增长难以维持, 我国经济增长中大上之后必然大下的历史经验教训足以说明这一点。反之, 经济增长率过低, 超出了控制下限, 就会出现资源的大量闲置浪费, 生产潜力无法正常发挥; 如果速度降为负值 (例如图中 B 点), 经济增长过程中断, 则更是对运行稳定的破坏。大上大下相互抵消的结果, 按一定时期计算的平均增长速度并不快。因此, 稳定的经济增长应该围绕趋势线波动较小 (例如图中 C 点以后的区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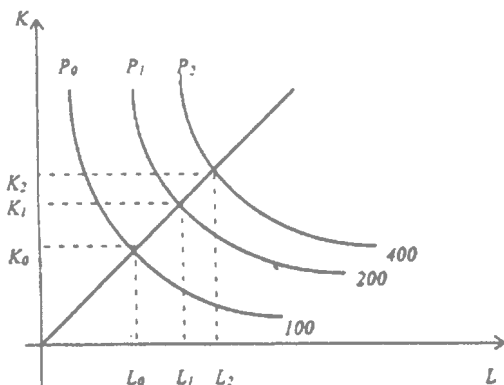
4. 效益显著。所谓效益显著标准是指经济增长应以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前提，即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增量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社会产品来。讲求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和高消耗来维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再快也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相反，即使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如果经济效益很好，增长的代价很小，则各方面仍然可以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

提高增长效益首先必须提高增长效率，即产出投入比。在这方面过去习惯上使用的指标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等，这些指标具有含义明确、计算简便等优点，但由于它们只是表示产出与某一特定生产要素投入量之间的关系，只能反映该特定生产要素投入的节约情况，而增长效率则是产出与各个生产要素投入组合综合比较的结果。因此，要准确地衡量增长效率的变化，就需要引入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即产出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通常用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率的差额来表示。影响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具体可以分为资源的重新配置、规模经济、知识进展等。其中，知识进展或者说广义的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全部要素生产率长期持续提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由于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体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所以，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经常被用以表示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增长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

应当指出的是，增长效益与增长效率并不总是一致的，正如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含义不同一样。经济效率指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而经济效益除此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产出应符合社会需要，这样就导致了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发生偏离的可能性。在同量的产出中，符合社会需要的程度越高，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的产品就越多，形成的社会价值也越大；相反，如果

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程度较低，就只能有较少的产品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形成的社会价值也相应较低，于是，在经济效率相同的情况下，经济效益却出现了较大差异。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这种关系，也适用于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如前所述，增长效率表现为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率的差额，增长效益则不仅取决于这个差额，而且还取决于包括这个差额在内的整个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程度。如果产出结构失衡，与社会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或者产品质量低下，难以为社会所接受，即使增长效率不变，增长效益也会降低；反之，则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表现为增长效益的提高快于增长效率的提高。当然，如果所有的产出都符合社会需要，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增长效益与增长效率最终将趋于一致。

经济增长的效益标准可以用（图 1.4）作一说明：



（图 1.4）

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只有资本(K)和劳动(L)两种投入要素，且二者配合比例不变。图中 P_0 、 P_1 和 P_2 分别为基期、第 1 期和第 2 期的等产量线，三个时期的产出水平分别为 100、200 和 400，每一时期产出的增长率相同，均为 100%，而各期的要素投入增长率